

# 民族主义的建构与彰显： 献旗英雄的塑造与四行“孤军”的悬旗护旗

周游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北京 100006)

**摘要:**在近代中国,国旗具有国家和政权(政治势力)的双重象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旗也如此。这一时期,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被赋予了浓厚的国民党意识形态,具有建构政权认同的政治功用。但是,到民族救亡的抗战时期,国旗的民族主义面相被凸显。杨惠敏为四行“孤军”献旗故事的传播,献旗英雄形象的塑造,以及“八百壮士”的悬旗和护旗,皆被赋予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象。在与“八百壮士”相关的献旗、悬旗和护旗中,国旗的党国意象被淡化,国家象征意义被强调。通过对四行“孤军”相关的国旗民族主义建构和彰显的考察,可以看到国旗象征意义在政治运用中的多种面相。

**关键词:**抗日战争;国旗;杨惠敏;“八百壮士”;四行“孤军”;献旗·悬旗·护旗;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8)02-0141-08

在近代中国,国旗既是国家的象征,也是政治势力的标识,国旗不仅是用来建构国家认同的政治符号,也是政治势力建构政治合法性的工具。国旗在近代中国的这一特质,也使其在政治运用上呈现一个复杂的面相。目前学界对近代中国的国旗虽然已有不少研究<sup>①</sup>,但是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旗主要还是集中于政治合法性的建构方面,对抗战时期国旗民族主义的建构和彰显还研究不足<sup>[1]178-204</sup>。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虽然被国民党赋予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也是国民党建构政治认同的政治符号之一,但是,以国旗建构民族主义和国家认同似乎也是“国旗”本该应有的功用,尤其在抗战爆发后,随着国人民族主义的高涨,国旗民族主义的象征意义也被不断凸显。基于此,本文以与“八百壮士”相关的献旗、悬旗和护旗为中心,来展现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与民族主义的建构和彰显等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会丰富我们对国旗这一国家象征政治运用复杂性的理解。

## 一 “国旗魂”:杨惠敏为“孤军”献旗英雄形象的塑造

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中,上海市商会童子军战地服务团的杨惠敏等童子军冒险为四行“孤军”献送国旗,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彰显中国人民抗战精神的民族主义故事。在献旗发生后,经社会各界宣传,献旗故事不断扩散,杨惠敏也被塑造成一位献旗英雄,被时人誉为“国旗魂”<sup>[2]</sup>。杨惠敏献旗英雄形象的塑造,是抗战时期时人建构民族主义的产物,也是杨惠敏本人和社会各界合力塑造的结果。关于献旗过程中的相关细节,已有学者进行了考证<sup>②</sup>,本文不再赘述。本节主要考察在献旗发生后,社会各界如何塑造杨惠敏这一献旗英雄形象。

在为四行“孤军”献旗的过程中,前后有多人参加,为何在献旗后只宣传杨惠敏一人?对此,当时参加献旗和运送给养的童子军战地服务团团长叶春年称:是出于他们继续留沪抗战的安全性考虑,同时又要宣传“军民一条心”,鼓舞民族士气,因此,宣传女童子军杨惠敏比

收稿日期:2017-04-18

作者简介:周游(1984—),男,陕西西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社会史研究。

较合适<sup>[3]85-86</sup>。一同献旗的叶德馨也说,献旗后,《立报》记者欲将此事刊诸报端,团长叶春年因担心影响抗日工作,坚决不让报道其他人<sup>[4]</sup>。因此,在10月29日《申报》、《中华日报》、《大晚报》等上海报纸的报道中,都强调是四十一号女童军杨惠敏献旗给“八百壮士”<sup>[5-7]</sup>。当日,《立报》记者还对杨惠敏进行了专访,并于30日予以专题报道,宣传她曾在东北参加义勇军进行抗日宣传,之后又南下上海参加童子军的英勇事迹。对报道杨惠敏的目的,该报称,欲借杨惠敏献旗的英勇事迹,刺激那些“不知亡国恨”的男女们,起来担负重建新中国的责任<sup>[8]</sup>。经这些报纸的宣传,杨惠敏为“八百壮士”献旗的英雄事迹被更多人知道。

“八百壮士”在与日军激战四昼夜奉命撤离四行仓库后,杨惠敏也于1938年3月初转战到当时的国防中心武汉。由于之前报纸对杨惠敏献旗事迹的报道,杨惠敏到武汉后频频受到媒体采访和受邀出席各种公开活动,她也借这些机会不断塑造和传播自己的献旗英雄形象,先后对自己以前的英勇事迹和献旗经历以多种形式讲述,这些内容都被报刊刊载。如《武汉日报》3月7日刊发了她的访谈<sup>[9]</sup>,《大侠魂》杂志于3月19日刊发了她的“自述”<sup>[10]</sup>,《战时童子军》4月2日刊发了她的“报告书”<sup>[11]</sup>。杨惠敏受邀所讲内容,一方面是献旗前在东北的抗日活动,一方面是在沪的献旗故事,而具体内容每篇侧重不同。如杨惠敏在写给《大侠魂周刊》的一篇“自述”里,讲述了自己“八·一三”事变后来上海童子军战地服务团去前线做侦探交通和锄奸工作,又如何主动请缨、孤身前往四行为“孤军”英勇献送国旗的故事<sup>[10]</sup>。杨惠敏所讲述的这些献旗细节,经报刊的刊载散布,进一步扩大了她的影响。

杨惠敏的献旗故事,除了以报刊的形式传播外,1938年上映的影片《八百壮士》则更加形象地展现了杨惠敏献旗的经过。为刻画她的英雄形象,导演在影片中增加了她冒险游过苏州河献旗的细节<sup>⑥</sup>。在淞沪抗战发生后不久,为宣传抗战,鼓舞民族士气,由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的抗战爱国电影《八百壮士》,也随即开拍,并于1938年7月完成。该片除了刻画爱国士兵坚强勇敢、不畏牺牲的抗战精神外,还突出了上海各界的广泛动员,尤其是爱国女童军杨惠敏(陈波儿饰)代表上海人民冒险献送国旗的情节和场面,展现了一位不怕牺牲为四行“孤军”献送国旗的女英雄形象<sup>[12]24</sup>。影片是这样展现杨惠敏献旗故事的:女童军杨惠敏代表上海300万市民,将一面国旗缠在脖子上,冒着敌人的轰炸扫射,泅水强渡苏州河,将国旗献给四行仓库守军<sup>[13-14]</sup>。这一影片传播范围极广,曾在抗战大后方、香港地区以及东南亚、

西欧地区上映,并得到一致好评<sup>[15]184</sup>。

在杨惠敏英雄形象的建构过程中,也有人将其献旗事迹作为抗日英雄故事予以讲述和宣传。例如,在1937年冬的一次“抗日同志会”畅谈会中,有人在讲述“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的故事时,就讲到杨惠敏献旗的故事,并且讲到了杨惠敏向“八百壮士”敬献国旗时“催人泪下、慷慨悲壮”的场景以及围观中国人的欢呼、士气大振的热烈场面等,在场的各位听众都感到“我们中国有希望”<sup>[16]36-38</sup>。一份杂志的人物记事,将杨惠敏描述成一个“以勇敢牺牲的精神,换取民族无上胜利”的人,来讲述她带着这份职责为四行“孤军”献旗的故事<sup>[17]</sup>。

作为一位献旗英雄,杨惠敏也被作为动员抗战的榜样。在榜样的建构中,杨惠敏献旗行为也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杨惠敏有多重身份,即女性、青年、童子军,与此相关的团体也常将杨惠敏作为其代表和榜样。1938年的“三·八”妇女节,武汉妇女团体在欢迎杨惠敏的茶话会中,一名叫“子毅”的作者指出,杨惠敏站在全国妇女界的前面,负起了妇女界应有的使命,这种伟大的贡献和精神,不仅是二万万女同胞的光荣,也是整个民族的光荣<sup>[18]</sup>。有人在讨论战时中国青年勇敢协助参与抗战工作时,也以杨惠敏为四行“孤军”冒险送国旗作为例证之一,证明他们是抗战建国的支柱,是民族解放的先锋队<sup>[19]</sup>。还有人将“童子军”身份的杨惠敏误为“儿童”,将其作为儿童参与抗战救国的楷模,讲述她勇敢为四行“孤军”献旗的故事<sup>[20]</sup>。

杨惠敏的英勇献旗行为,使她受到宋美龄、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和张治中等国民政府要人的接见<sup>[21]</sup>,这也为她带来了更多的声誉和资本。作为给四行“孤军”献送国旗的抗日英雄,杨惠敏在武汉受到礼遇。她受到隆重的接待,也是对其英雄形象的认可和强化。杨惠敏3月初刚到武汉时,汉口的“铸魂学社”就派人带着被子、毛毯来慰问这位抗战女英雄,还专门召开欢迎会<sup>[10]</sup>。武汉市童子军分部还特意杨瑞符、杨惠敏制作锦旗两面,一书“四方之守”赠给杨瑞符,一书“寄命国徽”赠予杨惠敏<sup>[22]</sup>。武汉妇女团体在召开的欢迎会中,还将书有“智、仁、勇”字样的锦旗赠给杨惠敏<sup>[23]</sup>。各团体在赠送杨惠敏的锦旗上,书以“寄命国徽”,“智、仁、勇”等样,是对杨惠敏英雄形象的肯定和宣传。

杨惠敏为“孤军”献旗的英雄形象,不仅被国人熟知,也被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所了解。这里除了前面提及的电影《八百壮士》在海外上映,将她的献旗故事带到全世界外<sup>[15]184</sup>,还有她曾借国民政府代表身份到美、欧开会游历之机,在宣传中国抗战意义的同时,讲述自己为四行“孤军”献旗的英勇事迹。当然,在杨惠敏的游

历过程中, 国外媒体也对她的献旗故事进行了宣传。

1938年8月15日至25日, 第二届世界青年和平大会在美国纽约举行, 大会主旨在于号召各国青年团结起来, 打倒一切侵略国家, 维护世界和平<sup>[24]</sup>。中国政府欲借此机会, 宣传日本侵华战争的真相和中国抗战的意义, 以获得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援助。中国政府共派出六名代表参会, 原拟定勇守四行仓库的营长杨瑞符参加, 由于他要参与一项重要作战计划而无法赴美, 故改派杨惠敏参加<sup>[25]</sup>。

在美国期间, 杨惠敏因为四行“孤军”献旗的英勇事迹而受到各方的欢迎。刚抵纽约时, 福斯公司就专门以杨惠敏登岸情形拍摄成新闻影片, 列入“儿女英雄传”内<sup>[26]</sup>。之后, 杨惠敏还到洛杉矶演讲, 好莱坞多家公司又为其拍摄新闻片, 并在各大影院上演<sup>[27]</sup>。杨惠敏在世界青年大会会场与罗斯福总统夫人合照, 罗夫人对其喜爱有加。美国奇闻作家李伯莱对杨惠敏尤为钦佩, 将其誉为“中国最英雄之儿女”<sup>[26]</sup>。据说, 杨惠敏所到之处, 皆让她讲述为“孤军”献旗的历险故事, 其中通过美国广播电台向全美300万听众讲述自己的抗战事迹是最为隆重的一次。8月22日, 杨惠敏被邀请参加美国广播电台每周一播出的“信不信由你”特别节目。节目开始, 先由电台播送中国剧《孤军》和日军侵占上海前的一些节目; 接着, 由主持人介绍四行“孤军”抗战的背景, 间隙还播放中国国歌; 介绍杨惠敏时, 主持人称其为“中国最勇敢的年轻姑娘”, 接着由杨惠敏报告自己献送国旗、到美国来之目的等内容<sup>[28]</sup>。

离开美国后, 中国代表团又前往英、比、荷、瑞、法等欧洲国家宣传中国抗战的意义, 以期获得更多的支持和援助<sup>[24]</sup>。在这些国家, 杨惠敏也常被邀请演讲。如在法国巴黎, 杨惠敏就被视为中国女英雄, 得到“中国之友协会”的隆重欢迎。在欢迎会中, 杨惠敏以华语演说蒋介石如何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战, 以争取各国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sup>[29]</sup>。

在自我和各界的宣传建构之下, 杨惠敏被塑造成一位献旗英雄, 一时享誉国内外。杨惠敏献旗英雄形象的塑造, 有上文中提到的各种宣传其他献送国旗者的不便, 也有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凝聚人心、鼓舞抗战士气的需要, 还有以示中国抗战坚强不屈以争取国际社会同情和支援的考虑。在抗日战争中, 虽然中国人民英勇抗战, 但中国的弱小、日本的强大是事实, 以“女童子军”这个通常被视为“弱小”群体作为塑造献旗英雄的对象, 一方面在于强调中国人民抗日的坚强不屈和决心, 一方面也更容易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援助。杨惠敏作为献旗英雄的塑造及国旗民族主义的凸显, 在这时都成为抗

战时期中国民族主义建构的一部分。

## 二 “发扬民族精神气”: 四行仓库悬旗

如果说杨惠敏献旗故事的传播, 献旗英雄形象的塑造, 彰显了献送国旗的民族主义行为, 那么“八百壮士”在四行仓库的悬旗也同样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象。四行“孤军”在1937年10月28日下午和深夜, 先后收到杨惠敏等上海童子军战地服务团团员送来的国旗, 并将国旗悬挂在四行仓库的窗口和顶楼上<sup>[30]</sup>。当四行“孤军”在仓库顶楼升起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后, 时人以具体行动和话语不断阐释悬挂国旗的意义, 抒发民族主义情感, 赋予悬挂中国国旗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象, 表达他们的抗战决心。

国旗是国家的象征, 悬挂国旗具有民族主义的象征意义, 尤其在面对外敌的侵略时, 悬挂国旗会给人们带来信心和希望, 激发国人的民族士气和抗战精神。当日军将完全占领上海华界、闸北地区已遍悬日本的太阳旗之时, 而在10月29日早上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却在四行仓库楼顶升起。当处于绝望之际的上海市民看到这一情景时, 都“雀跃万分, 拍掌欢呼”<sup>[31]</sup>; 凡行经该地之民众, 均纷纷脱帽鞠躬, 向国旗及忠勇驻守四行仓库的将士致敬<sup>[32]</sup>。据报道, 当看到四行仓库的国旗和奋勇杀敌的战士时, 隔岸群众“感动流泪”, 还有不少人同声大呼: “中华民国万岁!” 当日, 从浜南各处而来的瞻望群众达3万余人<sup>[33]</sup>。

国旗的悬挂, 在给上海市民以些许的希望和信心的同时, 也展现了中国人民对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和精神。当时《立报》报道就称, 四行仓库屋顶挂起国旗, 意在昭示外界“中国战士还在闸北, 与国土国旗同在”<sup>[33]</sup>。一名叫史良的作者就强调“闸北并未失守”, 因为还有两营的战士在战斗, 尤其重要的是“代表国家的国旗, 正飘扬在闸北的高处, 你能说他已经沦陷了吗”<sup>[34]</sup>? 还有评论称: “我壮士固守在闸北领土上, 我国旗招展在闸北天空上, 闸北当然还是我们的。”<sup>[35]</sup>对“八百壮士”悬挂国旗的意义, 当时驻扎在四行仓库的战地记者曹聚仁也表示, 四行“孤军”的枪声, 四行仓库楼顶的那面国旗, 维持着上海的人心, “也给日军的尊严以绝大的打击”<sup>[36]</sup><sup>84</sup>。

正是由于在此危难之际, 悬挂国旗具有激发中国人民抗战士气的功效, 因此四行“孤军”的悬旗也被时人不断阐释和强调, 赋予更多的民族主义意义。例如, 10月29日, 中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在四行仓库的楼顶升起, 也被认为是保持中华民国伟大国格之表现<sup>[37]</sup>。有记者就表示, 我国将士高揭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 压倒四周之太阳旗, 发扬了我大中华民族之浩然正气和中华民国无上之光辉, 此“八百”忠勇壮士之义举, 已博得全

上海中外人民的无限钦佩,引起热烈之注意,使前线战事之进展反成次要<sup>[38]</sup>。也有报道称,飘扬于四行仓库屋顶之国旗,“实为我大中华民族国魂之所寄”<sup>[39-40]</sup>。还有记者表示,这面鲜明夺目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飘扬于崇楼屋顶,“凜然表示不可凌犯之壮气,诚开欧战有史以来未有之壮烈记录也”<sup>[41]</sup>。

这些对“八百壮士”在四行仓库悬旗的报道和悬旗意义的表达,意在以升悬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来展示中国人民抗战的精神和决心。对此,一位名叫刘寿祥的作者,在谈及四行仓库悬挂国旗的意义时指出,八百勇士死守四行仓库,“没有国旗高揭空际,不足以发扬我国国威,表示中华民族的抗战精神,而以寒敌人之胆,怯敌寇之气”,“没有国旗高揭空际,不足以表示孤军留守,与发挥八百勇士的御辱精神,而以壮勇士之气,决杀敌之志”<sup>[42]</sup>。在这里,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被赋予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象,直指日本侵略者,在四行仓库悬挂国旗也成为中国人民抗战决心的象征。

除了各报刊媒体以文字报道的形式阐释悬挂国旗的意义外,《抗日画报》、《良友画报》、《总动员画报》、《血战画报》、《中华》和《众生》等杂志纷纷以图像和文字相结合的形式展示悬旗的意义,将四行仓库顶楼悬挂国旗的照片贴出,并配以文字进行解说,说明悬挂国旗的伟大意义<sup>[43-48]</sup>。例如,《良友画报》在照片下面指出,中国国旗飘扬于四行仓库之上,为中国增光不少<sup>[43]</sup>;《抗日画报》也在解说词中表示,中国“国旗飘扬,令人生敬”<sup>[44]</sup>。

除此之外,“八百壮士”在四行仓库升起中国国旗后,文艺界也以悬旗为主题,以诗歌、戏剧等文学形式,阐释在四行仓库顶楼悬旗的意义,展示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激励中国人民抗战的士气。王统照在为四行“孤军”作的一首诗里写道:“火焰中竖一竿鲜艳的旗帜,聚合起全民族血液写成无形字!火焰中竖一竿鲜艳的旗帜,向全世界、全历史,挥动我们的勇力!”“火焰中竖一竿鲜艳的旗帜,摇燃着人世间滚热的心意!有人处都听到她的誓词:‘中华永在,保护我的国土!’”<sup>[49]</sup>严祥源也作诗赞扬悬旗的意义,称:“巍然独立天空间,发扬民族精神气”,“四行仓库屋顶上,巍然独立我国旗”<sup>[50]</sup>。文艺界编的一首《八百壮士战歌》,歌颂“八百壮士”的英勇抗战,一再强调“中国不会亡”,称:“我们的国旗在重围中飘扬、飘扬、飘扬,八百壮士一条心,十万强敌不敢当”<sup>[51]</sup><sup>[227-228]</sup>,就以国旗来凝聚战士的国家认同、激发他们的士气和斗志。

“八百壮士”保卫四行仓库的英雄事迹,还被编排成多种戏剧。在一个三幕剧的结尾,展现的是驻守军官升国旗的场景。当国旗升上四行仓库的楼顶时,大家高呼

“闸北万岁”、“大上海万岁”、“大中华民国万岁”、“大中华民国国旗万岁”等口号<sup>[52]</sup>。在悬挂国旗与高呼口号的情景中,悬挂国旗与闸北、上海、中国的存在有了意义上的关联,悬旗已成为这些地方独立自由的象征。

在另一篇短文中,作者讲述了一个阐释悬旗意义的故事。该作者从上海沦陷开始讲起。在日军疯狂的进攻下,“八百壮士”仍然坚守四行仓库,租界的英国士兵们在本国的历史中从没有见到过如此忠勇的故事,认为非常危险,让翻译告诉四行“孤军”尽快撤退,不然死路一条。翻译跑回来说,他们知道会死,但是不愿撤退,他们说:“为谋祖国的自由解放,死不是可怕的事。”等中华民国的国旗缓缓地登上四行仓库的高屋顶后,英国士兵看见那面国旗,把烟头丢进河里,拍着翻译的肩头说:“你们中国不会亡的!”<sup>[53]</sup><sup>[83-85]</sup>这个故事借翻译之口表现了四行“孤军”的忠勇,借英国士兵之口表达了悬旗与中国人民抗战的精神,国旗的悬挂也预示了中国是不会亡国的。

### 三 “为我民族争光荣”:“孤军营”升旗与护旗

1937年10月27日,在日军向四行仓库发起攻击后,英、美租界当局以四行仓库的中日激战危及到租界安全为由,出面予以“调停”。1937年10月30日,奉南京国民政府之命,谢晋元率领“八百壮士”通过租界撤出四行仓库。“八百壮士”原商定由沪西返回师部继续参加抗日,不料租界当局屈服于日军压力,将四行“孤军”解除武装,囚禁于胶州路的一座空地里,并派万国商团的白俄士兵看管。四行“孤军”从此失去人身自由,囚禁他们的地方被时人称为“孤军营”。“八百壮士”虽然被囚禁于“孤军营”,但出于爱国之情的表达,也努力争取在重要的纪念日升悬国旗,在冲突中极力护旗。他们在“孤军营”的升旗与护旗也是对国旗民族主义象征意义的彰显。

发生在1938年8月11日的“孤军事件”,是“八百壮士”为纪念国民党八十八师“八·一一”出师动员,在“孤军营”升悬国旗时却横遭白俄士兵阻止而发生的一次中外冲突<sup>④</sup>。在这次事件中,“八百壮士”的努力抗争,国人的声援营救,都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国家认同和反抗侵略的民族主义精神。作为此事件关节点的“孤军营”,其升旗护旗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众所周知,国旗是国家的象征,悬挂国旗具有激发民族主义情绪、凝聚国家认同的效果,这样的效果在两国交战、民族危难之际尤为明显。同时,国旗作为国家的象征,在租界和当时的日本占领区升悬中国国旗,也是中国国民爱国的表达,是对在自己国土上升悬国旗权利的强调,也是对中国国家主权的宣示。因此,在1938年的“孤军事件”中,“八百壮

士”在“孤军营”升旗护旗的行为,以及之后“八百壮士”和其他中国人民对此权利的强调和捍卫,也是“为我民族争光光荣”<sup>[54]</sup>。

在民国建立后,国民政府即通过教育、宣传等系统普及国旗观念,强调国旗代表国家,倡导“敬旗爱国”,以建构国民的国家认同。如1917年教育部在通令中就将国旗比作国民“托命”之物,希望国民像对待国家一样对待国旗<sup>[55]</sup>。虽然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旗被赋予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具有国家和国民党政权的双重象征意义,而且大多数时候凸显的是国旗的国民党意识形态,是国民党建构政权认同的政治符号,但是不可否认,当中国受到外敌的侵害、中外民族矛盾激化时,国旗的国民党意识形态也被淡化,民族主义面相则被凸显,升悬国旗也是对爱国的表达。如谢晋元称“八百壮士”于8月11日在“孤军营”升旗的动因,即在于表达战士的“爱国情愫”和对国家的敬仰<sup>[56]</sup>。

“八百壮士”虽然被羁押在“孤军营”,但是正如谢晋元在质问工部局的信函中所言,他们不是俘虏也非罪犯,升悬国旗是他们爱国情绪的表达,而且在纪念日升悬国旗还经过租界当局的同意<sup>[56]</sup>。他们的升旗是具有正当性的。更重要的是,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具有威严性和神圣性,是决不可侵犯的;而且,升旗降旗也有其象征意义,国旗一旦升起就不能随意降落,被强迫降旗是对国家的侮辱,辱旗即辱国,这也是爱国的四行“孤军”将士所不能容忍的。所以,8月11日中午,当万国商团的马飞少校突然“奉令限十分钟将旗杆拆下”时,谢晋元一方面表示在纪念日升旗一事已为租界允许,一方面强调国旗一旦升起,就不能贸然降落,予以拒绝<sup>[57]</sup>。

但是,马飞很快带来大批白俄士兵,强行要求四行“孤军”降旗,“八百壮士”见辱,愤而护旗,终因寡不敌众,“孤军”伤90多人、3人殉难,在冲突中旗杆也被白俄士兵锯断,国旗也被抢走<sup>[58]</sup>。从当日下午五时起,“八百壮士”为争取在“孤军营”悬挂国旗,全体绝食抗议工部局。12日6时,四行“孤军”为表达爱国之情,在无国旗之情况下,由谢晋元率全体官兵,围绕拔去旗杆的空地,立正致敬,以“我人头上有青天白日,脚下有同志的鲜血,足以代表伟大的国旗”,举行“精神升旗”<sup>[59]</sup>。8月13日,“孤军营”官兵为纪念“八·一三”,仍坚持在绝食中进行“精神升旗”<sup>[57]</sup>。

在这次“孤军事件”中,“八百壮士”正当的悬旗行为遭到了白俄士兵突如其来的暴力干涉,中国国旗被强行降下和拿走,“孤军”将士也在护旗中伤亡惨重。辱旗即是辱国,租界当局派人暴力降旗和辱旗,是对中国的“辱蔑”<sup>[60]</sup>。而“八百壮士”事前对升旗权利的争取,事中英

勇的护旗行为,事后对上海工部局的绝食抗议,都展现了他们作为中国人对在自己国土上升悬国旗权利的强调以及对国家主权的捍卫。

升悬国旗,既是国民爱国情绪的表达,也是他们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即便在租界也是如此,因为租界也是中国的领土。早在7月22日“八百壮士”准备升旗却遭到万国商团的马飞少校阻止时,谢晋元就以悬挂国旗既不扰乱秩序,也没有对任何国家有敌对行为,“此属任何国民尊崇其国家应有之权利”,予以辩驳<sup>[56]</sup>。上海钱兑业工会在给工部局的抗议函中就强调,一国之国旗,“其人民皆有敬护之天职,亦即文野之分界”,四行“孤军”非俘虏,“悬旗纪念为当然之自由”<sup>[61]</sup>。对这一升悬国旗的权利和自由,也是在“孤军事件”后中国外交部与工部局谈判中力争的一项权利<sup>[62]</sup>。一名叫“有涛”的作者也表示,国旗是国家的代表,“所以凡是中国人民,都有升悬国旗的自由,而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干涉。租界也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在租界有升旗的权利<sup>[63]</sup>。

在“孤军事件”发生后,各界纷纷对“八百壮士”的安危表示关切,对他们的护旗行为表示钦佩和支持,并向沪工部局提出抗议<sup>[64-66]</sup>。国民政府外交部向沪公共租界涉事各界提出严重抗议,同时进行积极交涉,以争取中国权利<sup>[67-68]</sup>。经过外交部、沪公共租界诸华董和沪工部局的交涉,8月20日,工部局派人将国旗“郑重”送还谢晋元,该国旗被取走后由营房管理员“小心折叠”,保存在工部局,未受损坏和污毁<sup>[69]</sup>。10月7日,谢晋元等十余名官兵被送回“孤军营”,沪工部局对冲突中殉难的三名士兵进行道歉和赔偿<sup>[70]</sup>。虽然中国人的抗议和交涉最终并未从“孤军营”救出“八百壮士”,使他们获得彻底的自由,但“八百壮士”的升旗和护旗行为却展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意义。正如一位名叫“广农”的作者指出,四行“孤军”的护旗运动,昭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中国国格的崇高庄严,不是任何强权暴力可以侵犯的<sup>[71]</sup>。

#### 四 结语

在近代中国,国旗具有国家和政权(政治势力)的双重象征。国旗作为国家的象征,本身就具有民族主义的意象,这也使其成为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政治符号之一。因此,政府在制定国旗时,也多从国家整合的角度赋予国旗新意,如民初五色旗是对“五族共和”象征意义的赋予。不过,国旗也常是政权(或政治势力)的标识和建构政权认同的符号。在近代中国,各政治势力常以派系(或政党)旗帜竞争国家旗帜,又以权力或武力塑造国旗的权威,以悬挂国旗建构政权认同。这样,国旗在某一层面上也成为政治势力传播意识形态、建构政治合法性的政治符号。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为实施以

党治国的训政,确实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党治国等政治学说和国民党革命建国的历史浓缩于国旗的象征意义之中,赋予了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强烈的“党国”意识形态。因此,国旗也是国民党建构政权认同、塑造“党国”之民的政治符号,对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的认同,也带有对国民党政权认同的意义。

但是,民族主义也是国旗的一个重要面相,是国旗本该具有的象征意义。尤其在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的民族主义象征意义不断被强调,国旗激发国民抗日情绪、凝聚国家

认同的功用也被凸显。本文提到杨惠敏为四行“孤军”献旗故事的传播,杨惠敏献旗英雄形象的塑造,以及“八百壮士”先后在四行仓库、“孤军营”的悬旗和护旗,国旗都被赋予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象。在这些国旗的民族主义建构和彰显中,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被淡化,国旗的民族主义意象被凸显。国旗作为国家的象征,在这些特殊的场域和事件中,被各界不断扩散和强化,成为国民想象民族国家的政治符号。通过对四行“孤军”相关的国旗民族主义建构和彰显的考察,可以看到国旗象征在不同时期和具体情境中政治运用的多种面相。

#### 注释:

- ①刘云波《论孙、黄“国旗式样之争”》,《中州学刊》1996年第6期,第139-143页;李学智《民国国旗之争》,《史学月刊》1998年第1期,第46-50页;汪林茂《清末第一面中国国旗的产生及其意义》,《故宫文化月刊》第10卷第7期,1992年10月,第17-23页;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98-105;游佐彻《大清国“黄龙旗”と20世纪の中国“国旗”》,日本冈山大学大学院文化科学研究科《文化共生学研究》第2号,2004年2月,第35-47页;丸田孝志著《国旗、领袖像:中共根据地的象征(1937-1949)》,刘译译,《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0卷,2009年,第323-341页;李军全《“统一”与“独立”的双重思虑:中共根据地节庆中的国旗和党旗》,《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第231-237页;小野寺史郎著《国旗、国歌与国庆:近代中国的国族主义与国家象征》,周俊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5-71、134-204页。
- ②相关献旗细节,参见:胡现岭《淞沪会战中杨惠敏献旗之真相》,《史学月刊》2009年第5期,第134-136页;谢继民著《我的父亲谢晋元将军》,团结出版社2010年版,第81-94页;胡皓磊《四行孤军的传说与真相》,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5-43页。
- ③实际上,杨惠敏并没有游过苏州河献旗。这一情节是《八百壮士》的电影导演为刻画杨惠敏的英勇形象而增加的一个情节,后来由于该电影影响很大,这一情节由虚转“实”,被时人和后人当成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对此,杨惠敏还在1939年发表文章,对此问题进行了纠正,说自己并没有游过苏州河献旗(见:杨惠敏《为八百壮士献旗两周年的回忆》,《民族公论》1939年第1期,第36页)。不过,杨惠敏在后来的自传中,却又增加了从苏州河游回租界的情节。这一情节与《八百壮士》电影中的情节非常相似,只不过她说自己是游过苏州河去献旗。她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可以增加自己的英雄形象,一方面她已在前面强调自己是通过英租界爬过铁丝网达到四行仓库的,大概此处不便推翻旧说,所以说是游回苏州河(见:杨惠敏《八百壮士与我》,佛之光杂志社出版部1979年版,第45页)。
- ④对“孤军事件”的过程,已有相关研究,此处不再赘述。参见:谢继民著《我的父亲谢晋元将军》,团结出版社2010年版,第165-176页。

#### 参考文献:

- [1]小野寺史郎.国旗、国歌与国庆:近代中国的国族主义与国家象征[M].周俊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 [2]李玉莲.“美人鱼”和“国旗魂”——杨秀琼与杨惠敏[J].大侠魂,1938,7(7-8):28.
- [3]叶春年.给四行仓库送旗的经过/曹志功.杨惠敏渡河献旗之真相[M]//谢继民.我的父亲谢晋元将军.北京:团结出版社,2010.
- [4]叶德馨.接济孤军补记[J].战时童子军,1938,(12):17.
- [5]国旗飘展 民众致敬[N].申报,1937-10-29(7).
- [6]孤军死守安全无恙 我壮士昨高揭国旗[N].中华日报,1937-10-29(1-1).
- [7]气壮山河 我孤军八百决死守不退[N].大晚报,1937-10-29(1).
- [8]向我闸北孤军献旗的四拾一号女童子军[N].立报,1930-10-30(3).
- [9]记者.访问女童军杨惠敏[J].半月文摘,1938,2(2):62.
- [10]杨惠敏自述[J].大侠魂,1938,7(7-8):12-14.
- [11]杨惠敏.献旗报告书[J].战时童子军,1938,(16):3.

- [12]程季华,等.中国电影发展史(初稿):第2卷[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
- [13]江鸟.八百壮士在港献映[N].申报,1939-01-22(18).
- [14]阳翰笙.八百壮士(电影剧本)[J].中苏文化·抗战特刊,1938,1(5):46.
- [15]温尚南.姑苏影人[M].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2.
- [16]衡振鹏.记抗日同志会的成立[G]//金湖文史资料:第3辑.淮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金湖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7.
- [17]夏江.记女童军杨惠敏[J].杂志,1939,4(5):42.
- [18]子毅.从欢迎杨惠敏谈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J].大侠魂,1938,7(7-8):16.
- [19]冯文彬.战时中国青年的新地位(西安特约航信)[N].申报(香港版),1939-05-27(2).
- [20]薇.几个模范儿童[N].申报(香港版),1939-06-28(2).
- [21]杨惠敏女士分谒蒋冯夫人[N].申报(汉口版),1938-03-05(2).
- [22]童军及妇女界欢迎杨惠敏[N].申报(汉口版),1938-03-07(2).
- [23]武汉妇女团体欢迎杨惠敏[N].申报(香港版),1938-03-08(2).
- [24]杨惠敏在重庆[J].少年时事读本,1939,1(32):17-18.
- [25]参加世青大会代表团今夕出国[N].申报(香港版),1938-07-16(4).
- [26]杨惠敏在美风头特健[J].玄妙观,1938,(创刊号):5.
- [27]中国英勇女童军杨惠敏在好莱坞新闻片上大出风头[J].电声周刊,1938,7(44):869.
- [28]新梦.一个中国姑娘在美国[N].申报,1938-11-01(16).
- [29]巴黎欢迎杨惠敏[J].妇女文献,1939,4(1):37.
- [30]胡现岭.淞沪会战中杨惠敏献旗之真相[J].史学月刊,2009,(5):136.
- [31]勇士高呼 民国万岁[N].申报,1937-10-29(7).
- [32]国旗飘展 民众致敬[N].申报,1937-10-29(7).
- [33]大中华男儿气壮山河 闸北孤军奋斗到底[N].立报,1938-10-30(2).
- [34]史良.闸北并未失手——应纠正的一种观念[N].大晚报,1937-10-29(1).
- [35]闸北的中华魂[N].大晚报,1937-10-29(2).
- [36]曹聚仁.“四行仓库”/“八字桥”[M]//万里行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 [37]周家桥敌谋渡河[N].申报,1937-10-29(2).
- [38]闸北一高楼 国旗招展[N].中央日报,1937-10-29(1-2).
- [39]孤军死守闸北之八百壮士奋勇却敌[N].中央日报,1937-10-30(1-2).
- [40]我国旗仍飘扬于四行仓库之顶[J].中央通信社稿,1937,(10):516.
- [41]国徽飘展气壮山河 我孤军四次退敌[N].申报,1937-10-30(3).
- [42]刘寿祥.欢迎八百孤军营长杨瑞符和献送国旗女童军杨惠敏[J].大侠魂,1938,7(7-8):4.
- [43]王开.孤军奋战记(照片)[J].良友画报,1937,(132):12.
- [44]杜鳌.八百壮士坚守孤垒(照片)[J].抗日画报,1937,(14):1.
- [45]八百壮士(照片)[J].总动员画报,1937,(2):9.
- [46]中华国旗飘扬闸北 八百壮士光争日月(照片)[J].血战画报,1937,(5):3.
- [47]孤军守闸北 抗战史上的光荣(照片)[J].中华,1937,(59):19.
- [48]八百孤军(照片)[J].众生,1938,(1):1.
- [49]王统照.火焰中竖一竿鲜艳的旗帜[J].国民,1937,1(18):419.
- [50]严祥源.我们的国旗[J].三一校刊,1938,5(7):65.
- [51]韦秉衡.关于“八百壮士”和广西航校二三事[G]//柳北文史:第11-12辑.柳州:政协柳州市柳北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组,1995.
- [52]岫云.国旗依然在闸北飘着(三幕剧)[J].战时文学,1938,1(4):3-7.
- [53]谷斯范.国旗依然在闸北飘着[G]//韩德青.抗战文选粹:第1集.上海:大东书局,1941.
- [54]为我民族争光荣 孤军绝食今四日[N].大晚报,1938-08-14(4).
- [55]咨各省区请将注重国旗剪发二项转知各演讲机关编为浅说详加劝导文[J].教育公报,1917,4(12):6-7.
- [56]孤军留血事件 谢晋元所述经过[N].华美晨报,1938-08-19(4).

- [57]苏武.孤军国旗案外记[J].血路,1938,(28):451.
- [58]四行孤军的国旗风潮[J].现世报,1938,(16):4.
- [59]孤军被辱经过[N].东南日报,1938-08-16(1).
- [60]社评.“四行”壮士升旗被辱[N].申报(香港版),1938-08-14(1).
- [61]钱兑业函工部局 为孤军声援[N].大晚报,1938-08-17(3).
- [62]四行孤军流血事件 事态不致扩大[N].新闻夜报,1938-08-18(1-3).
- [63]有涛.我们难道不能在自己的国土上悬挂国旗吗? [N].宁波商报,1938-08-18(2).
- [64]四行孤军与俄队冲突经过详纪[N].新闻夜报,1938-08-14(1-4).
- [65]“八·一三”的大上海[N].宁波商报,1938-08-14(4).
- [66]英勇孤军将士 继续绝食抵抗[N].华美晨报,1938-08-14(4).
- [67]蒋委员长营救八百壮士[N].新华日报(重庆版),1938-08-14(2).
- [68]外交部电复各公团[N].大美晚报,1938-09-02(4).
- [69]孤军事件告一段落 工部局送还国旗[N].华美晨报,1938-08-21(4).
- [70]孤军悬旗案解决 工部局表示遗憾[N].华美晨报,1938-10-08(4).
- [71]广农.守护我们的国旗[J].抗敌导报,1938,(30):8.

## Construction and Prominence of Nationalism: Making the Hero Presenting National Flag for “Eight Hundred Heroes” and the Hoisting and Protecting National Flag by “Eight Hundred Heroes”

ZHOU You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China)

**Abstract:** In modern China, national flag had double symbols of the nation-state and regime (political forces). The national flag of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has this characteristic too. At that time, the flag of “Blue Sky, White Sun, and a Wholly Red Earth” was endowed with a strong ideology of “Party-State”, and became a political symbol of regime identity. Moreover, the symbol of the nationalism was constantly highlighted when Chinese began to save the nation from extinctio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Making and disseminating the hero YANG Hui-min who presented the national flag to “Eight Hundred Heroes” and the story of presenting, hoisting and protecting the national flag by “Eight Hundred Heroes”, were all endowed with strong nationalist imagery. Meanwhi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presenting, hoisting and protecting the national flag, the ideology of “Party-State” was diluted, while the symbol of the Nation-State was emphasized. By study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prominence of nationalism the National Flag related to “Eight Hundred Heroes”, multi-faceted political use of national symbol is revealed.

**Key words:** anti-Japanese War; national flag; YANG Hui-min; “Eight Hundred Heroes”; Si Hang Warehouse; presenting, hoisting and protecting national flag; nationalism

[责任编辑:凌兴珍]